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 (1600—1840)

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 GDP 的估算

刘 逖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

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 GDP 的估算

刘 逖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 GDP 的估算/刘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338-6

I. ①前… II. ①刘…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1600~1840 IV. ①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7171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龚 权

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

——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 GDP 的估算

刘 逖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206,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338-6/F·1959

定价 29.00 元

序

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由来已久,近些年来大有别开生面之势。可以套用一句古话:“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大概是缘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觉得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必要,于是新论迭出。

远的且不说,就近几年的事情略说一二,便可见一斑。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就是一个最现成的事例。

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美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目是:《当中国称霸海上》;英国学者孟席斯(Gavin Monzi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目是:《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的一年》。读了他们的著作,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以往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评价显得过于肤浅。李露晔说郑和的宝船载重7000吨,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建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最大的“圣迦布利尔号”载重120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孟席斯的结论惊世骇俗:郑和船队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实现了环球航行。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引起更大反响的是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以及前近代中国经济地位的重新认定,这方面的代表者,非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莫属。

美国学者弗兰克的专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明白无误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他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因为这样的关系，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通过贸易途径流入了中国。

请注意，白银是当时的硬通货，也就是弗兰克所说的“白银资本”。全球白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作为贸易支付手段流入中国，是已经被历史学家证明了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是，是否由此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呢？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对此曾经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专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题材和角度与弗兰克相去甚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结论是：直到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对题目“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作了解释，进一步说明他写此书，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是有可比性的。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亚。比较的结果，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停滞。他认为，欧洲核心区(北大西洋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19世纪时才出现。在此

之前,即 18 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说得浅显一点,在 18 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可能超过欧洲的英格兰,至少并不比它落后。彭慕兰的这本著作 2001 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却引来了颇多的争议,激烈的辩论从美国延伸到中国,也许还会延伸到将来。

上述两本大作,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书后洋洋洒洒几十页参考文献,便可窥知是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并非故意耸人听闻的信口开河。学术贵在创新,人们应该善待创新。创新必然是不完善的,需要在百家争鸣中趋向完善。

从这样的背景去看麦迪森关于历史时期中国 GDP 的研究,很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麦迪森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魅力无穷,令人大开眼界。他说:1700 年,中国和欧洲的 GDP 在世界 GDP 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22.3%(中国)、24.9%(欧洲);1820 年则分别为 32.9%(中国)、26.6%(欧洲);1700—1820 年间 GDP 增长率,中国为 0.85%,欧洲为 0.65%。由于我长期研究明清经济史,对这些数据具有职业的敏感性,怀有极大的兴趣。可惜受制于自己的学识涵养及研究能力,不可能另建一套数据来衡量麦氏结论的可信程度,只能持疑信参半的谨慎态度。

大约在一年以前,彭慕兰教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作学术讲演,我向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和黄宗智教授的学术论辩,另一个就是关于麦迪森的 GDP 统计。我向他请教,麦迪森估计 170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 22.3%,似乎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处于发展的高峰,而 1820 年中国已经由盛转衰,为何 GDP 不降反升?令人不可思议。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彭慕兰的回答十分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麦迪森完全搞错了。限于时间,他没有展开论证,不过已经显示了美国同行的一种学术观点。

鉴于清史学界有的学者撰文征引麦迪森的数据,倡言乾隆时代中国 GDP 可能领先于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议。麦迪森新著的中译本《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2008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闻界作为热点予以报道,使他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在这种情况下,辨明麦迪森数据的可信度,显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经济学博士刘逖在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就是想提供一家之言,参与学术争鸣,辨明历史真相。他对麦迪森的数据进行商榷,较为深入细致地对 1600 年到 1840 年中国经济总量提出自己的估算数据,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这一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一种回应,其价值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

阅读刘逖的这本著作,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长期致力于对各国经济总量的比较研究,1998 年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未来》一书,对公元 1 世纪至 20 世纪末中国经济总量和长期发展,作了一个宏观的鸟瞰。2007 年,麦迪森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把研究的时间跨度延伸至 2030 年。该书的第一版中译本 1999 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它的第二版中译本,题名《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2008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麦迪森估算了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 GDP,结论是:中国 GDP 在公元元年占世界 GDP 总量的 26.2%,在公元 1000 年占 22.7%,在公元 1500 年占 25.0%,在公元 1600 年占 29.2%,在公元 1700 年占 22.3%,公元 1820 年占 32.9%。他的这一结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赞扬者有之,非议者有之。现在看来,似乎非议者略占上风。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当然有它的长处,可以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但必须用已经被证实的历史知识相互验证,

使之更具说服力。由于历史时期统计数字的缺乏,史料又含糊其词,要进行计量分析统计,有很大的困难,容易导致离奇的错误。计量史学最为人们诟病的笑话,就是有人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南北方经济,用一大堆数据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南方经济比北方更为发达更为先进,显然有悖于人们已有的历史常识。那么,麦迪森的研究如何呢?这是需要验证的。

刘逖的研究,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从人口与耕地的统计数字入手,进而分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状况,同时考虑到这一时期物价的变化趋势,以及币值的换算,来求得较为接近于事实的统计数字。他发现麦迪森的一个基本错误:麦迪森假定从明代中期一直到清代中期(1500—1820年),中国人均GDP未发生变化,按19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均为600美元,这与他其他地方所作的研究明显的自相矛盾。

刘逖验证的结论,迥异于麦迪森:在前近代时期(1600—18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16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1820年下降到五分之一,1840年不到五分之一。1820年的数据只有麦迪森估计值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大约为英国的40%,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从总体上看,1600年至1840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刘逖看来,麦迪森的宏观数据,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误差。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究竟谁的估计数字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得由别的学者来做出判断。读者诸君如果对此有兴趣,不妨先睹为快,作出你们的判断。

樊树志

目 录

序	樊树志	1
第一章 引言		1
一、“大分流”前后的世界:研究缘起与研究目标		1
二、为什么选择 1600 年至 1840 年作为研究对象?		6
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方法的说明		7
四、其他若干关键难点的说明		13
第二章 安格斯·麦迪森和相关研究综述		21
一、安格斯·麦迪森		21
二、保罗·贝洛赫		26
三、国内学者以及相关研究		30
第三章 人口与耕地的变动趋势		38
一、1600 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变化		38
二、1600 年以来中国耕地的变化		43
第四章 农业和其他第一产业		46
一、行业分类与统计口径的说明		46
二、粮食部门:生产法		47
三、粮食部门:以支出法校验		55

四、经济作物	59
五、畜牧、林业和渔业	64
第五章 早期工业和建筑业	70
一、麦迪森对农业以外经济活动的估计	70
二、采矿和冶炼	72
三、手工制造与建筑	78
第六章 商业和服务业	86
一、麦迪森对服务业的估计	86
二、商业和运输	87
三、货币与金融	91
四、房地产	96
五、政府服务	98
六、专业和其他服务	103
第七章 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	113
一、产业结构的演进	113
二、传统经济中的公共部门	115
三、积累与投资	119
四、收入分配	122
第八章 历史与国际比较	128
一、1600 年以来物价的变化	128
二、实际和人均 GDP 增长率	131
三、以美元和国际元计值	134
四、麦迪森的自相矛盾之处	138
五、最后的校正	142
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149

第九章 后论：从总量看明清工业化转型问题	155
一、与相关研究的比较	155
二、从总量经济看明清工业化停滞之谜	158
三、超越总量经济	171
附 录	179
表一 前近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分布 (1600—1840 年)	179
表二 安格斯·麦迪森各国和地区人均 GDP 统计(1—2000 年)	181
表三 保罗·贝洛赫的各国人均 GNP 统计(1700—1960 年)	185
表四 英国物价统计(1300—1840 年)	193
表五 英国工资水平统计(1300—1840 年)	207
表六 金银价格统计(1300—2000 年)	215
表七 美国物价与 GDP 统计(1774—2000 年)	227
参考文献	235
后 记	261

第一章

引言

一、“大分流”前后的世界：研究缘起与研究目标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浪潮,强调以“全球眼光”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1]在这一大背景下,重新定位前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成了海内外学者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著作^[2],都以其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并重新考察了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与动力。

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著作在欧美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部著作出版伊始即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彭氏著作还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言,弗兰克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之上,这无疑是对抗“欧洲中心论”的有力武器。^[3]在这部著作中,弗兰克把前近代中国看作是世界经济体的中心,由此重塑了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尽管弗兰克在书中一再强调“全球主义”这一基本主张,但“东方中心论”的论调却经常溢于言表。书中多次写到了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例如:“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国是全球经济同心圆“最核心的一圈”,“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4]

与弗兰克不同,彭慕兰、王国斌等学者的著作则相对要保守一些。彭慕兰的《大分流》被认为是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在这部著作中,彭慕兰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置于全球历史的大背景中,对18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和中国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认为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欧洲和中国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彭慕兰认为,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纪,而在19世纪;不是始于农场,而是来源于海外和地下,只有当英国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压力时,它才有可能走上分流的道路。

彭慕兰认为,与中国江南地区相比,英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最终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虽然同样强调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认为在 19 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但更倾向于从多元化的角度讨论问题。作者似乎认为,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中国或其他中心论出发来观察世界,情况亦然。因此,作者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经济与政治情况纳入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深入剖析各自的独特之处。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李伯重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5]彭慕兰即大量引用了李伯重的著作。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而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市场的扩大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而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中国由于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因此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李伯重有力地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英国模式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形成

了全国市场,这个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6]李伯重认为,英国模式的特点,也即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使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微不足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李伯重进一步推论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但这种可能性很小。^[7]

在以上基于全球或整体主义的中西经济史比较成果中,处处可见微观的经济比较数据和资料,比如在彭慕兰、李伯重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江南农业生产、棉丝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生产的数据。但遗憾的是,对前近代中国和西欧的整体/宏观经济的数量比较则极为匮乏。弗兰克和相关学者多次引用了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和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而据贝洛赫的估算,在1800年时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美元。但是,根据麦迪森后来修正的估算,在1820年,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有世界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但西欧国家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是中国一倍以上。但总体上看,这些宏观估计数据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巨大的差距和误差。

安格斯·麦迪森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总量的比较研究,他于1998年发表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8],其对中国经济总量和长期发展研究的时间跨度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1995年。2007年,麦迪森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将研究的时间跨度拓展到了2030年,并更新了部分资料。麦迪森的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国内学者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思考。^[9]

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是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最关键的指标。对相关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宏观比较,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史进行定量化的整体研究,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项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把握整个经济的全貌,从而对有关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长时段梳理;同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提出的,历史上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总量经济结构,不仅决定了后来国家间的贫富悬殊,也是产业结构演变周期的重要标志。^[10]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试图对安格斯·麦迪森对古代中国GDP估算的方法和结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估中国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1600—184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相信,这样一项研究,不仅可为基于全球主义的中西经济史比较研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也为古代中国经济系统研究本身所需要。^[11]

我们试图实现如下研究目标:

(1) 对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中国古代GDP数据进行客观考察,校正其错误,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情况进行量化考察,为未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提供相关素材。^[12]

(2) 提出统计古代GDP的新方法,为以后统计中国历朝GDP提出方法论依据。

(3) 提供一个纵向与横向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标准,为国际上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关于中国的补充证据。

(4) 通过研究该时期中国 GDP、人口增长、人均收入、产业结构、政府规模、资本积累、收入分布等宏观经济变量,探讨古代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干因素,为解释相关时期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的另外一个考虑,是基于现实世界的需要,即从定量角度客观认识全球主义或“中国中心论”的影响。客观而论,前述基于全球或整体主义的中西经济史比较研究成果,在中国读者中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身处一个正在积极追求大国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国家,这种研究无疑会给国人增加本来可能略显不足的自信;但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也可能会无端带给国人一些不切实际的盲目幻想,甚至会使我们失去本应具备的恰当的谨慎。我希望本书成果有助于加强国人为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审慎意识。

二、为什么选择 1600 年至 1840 年作为研究对象?

1600 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 1840 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那一年,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在这种全球主义研究的背后,我们希望能有更翔实、更有说服力的数字来支撑或反驳他们的论点。这是我们选择 1600 年至 1840 年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考虑。

这个时期也是欧洲资本主义从萌芽走向大发展的时期。在 14、15 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在地中海地区萌芽,紧接着的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殖民地的拓展,进一步促进了欧洲资本